

ZhongGuo NongYe ShengYu LaoDongLi
ZhuanYi WenTi YanJiu
Yi ChanYe JieGou BianDong Wei ZhuXian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 转移问题研究

——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

赵显洲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感谢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基金
为本书出版所提供的资助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 转移问题研究

——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

赵显洲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 / 赵显洲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058 - 9345 - 0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农村 - 劳动力转移 - 研究 - 中国 IV. ①F323.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1325 号

责任编辑：王志华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

赵显洲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13.5 印张 200000 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345 - 0 定价：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 的几个理论问题 (代序)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劳动经济领域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高强度和长时间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改善了我国收入分配的结构、软化了我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刚性，并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 30 年的高速增长。正当理论界以极大的热情来研究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途径、方法和经济效应的时候，2004 年初，在深圳、东莞、莆田等珠三角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随后，“民工荒”开始向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甚至河南、安徽、四川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地蔓延。到 2009 年下半年为止，除 2007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短期的农民工“返乡潮”外，“民工荒”一直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征。

为探求农民工短缺的真正原因，理论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争论。有的研究者认为，农民工短缺是一个结构问题和短期问题，^① 是农民工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工资水平低下、农业

① 樊纲：《民工荒是一个短期暂时性问题》，新浪财经 [2005-09-10]：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50910/11091957853.shtml。

的比较收益提高、流动成本太大、特定地区产业结构对特定年龄阶段和特定技能工人的过分依赖等因素的必然结果。^①但也有研究者反对上述观点，认为“中国有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不过是一个“旷日持久的神话”，^②“目前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并预期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③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理论界的强烈反响，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此论“虽然语出惊人，但并非正确，由此而产生误导，影响到学术界甚至是当局者的决策”。^④至此，始于2004年这场有关“民工荒”的争论似有升级的迹象。上述争论涉及的基本问题包括：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中国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如果中国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如何解释近几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本书以下内容将围绕上述基本问题展开理论分析，以供商榷。

一、刘易斯转折点：第一个点还是第二个点

1954年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 W. A.）在其经典论文《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

① 很多研究都支持这种观点，如：刘尔铎：《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与“民工荒”》，载于《人口学刊》2006年第1期，第3～6页；李士梅、徐志勇：《我国东南“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载于《人口学刊》2005年第3期，第23～27页；章铮、谭琴：《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效应——兼论“民工荒”》，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7期，第5～11页。

② 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载于《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2期，第2～7页。

③ 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人口与就业绿皮书（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学部工作局网站[2007-05-05]：<http://kyj.cass.cn/Article/612.html>。

④ 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载于《经济学家》2008年第1期，第117～119页。

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刘易斯假设在一国经济中存在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代表落后生产力的农业部门，同时由于刘易斯认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极低，因而在一个固定的工资水平上，工业部门面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即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这两个假设出发，刘易斯描绘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灿烂图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固定不变的工资率下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增加，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向外移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向了工业部门，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下去，直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所吸收。此时，如果工业部门继续扩大生产，其面临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将由水平变得向右上倾斜，如果工业部门不增加工资，将不再可能从农业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①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倾斜的那一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尽管刘易斯 1954 年的模型描绘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可能途径，并提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全新思路，但这个模型的不足是明显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所谓边际产品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对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形成无限供给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二是这个模型描绘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它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发展的作用。如果农业部门的收入长期维持在生存水平上，那么在封闭条件下农业部门将无力购买工业品，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也无法完成。即使工业部门可以将工业品出口而赚取外汇，但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至转折点以后，农产品总量的减少将不能满足整个人口的生存需要。也就

^① Lewis W. A. ,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22 (may), 1954: 139 - 191

是说,在封闭条件下,刘易斯 1954 模型所描绘的农业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的部分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更进一步地说,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正是因为刘易斯模型存在的上述不足,一些学者开始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正,这种修正集中地体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经济学家拉尼斯 (Ranis Gustav) 和费景汉 (Fei John C. H.) 提出的“费—拉模型”中。“费—拉模型”的主要内容可概括如下:在农业技术和土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农业劳动投入的增加,总有一部分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这种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为“多余劳动力”。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工资应等于农业部门的人均产出,即使存在剩余劳动,他们也同样应当获取这个收入,因为如果一个劳动力的收入低于平均产品,那么他的生存将出现问题,并将这一平均收入称之为“不变制度工资”。在此基础上,拉尼斯和费景汉把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低于平均收入的劳动力称之为“伪装失业者”。这样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多余劳动力”,一部分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低于农业平均收入的“伪装失业者”。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是将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那部分劳动者先转移出来;第二阶段是将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平均收入的那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来;第三阶段是对农业中边际生产率大于平均收入的劳动力进行转移。在第二阶段,由于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农业的总产出将下降,在农业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粮食供给将出现短缺,因而,第二阶段的起始点被他们称为“短缺点”。在第三阶段,由于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全部被转出,工农两部门都将面临向右上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两部门的工资均由市场决定,农业部门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因而第三阶段的起始点

被他们称作“产业化点”。^①

刘易斯本人也意识到1954年模型的不足，于1972年在国际经济和发展杂志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对其1954年的模型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修正。刘易斯写到：“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可以设想工资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这时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在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停止，其平均收入提高了，并使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上升时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这样我们便到达了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的状态”，^②在这里，刘易斯也提到了两个转折点，两个转折点的含义分别与“费—拉模型”中的“短缺点”和“产业化点”的含义相同，只是推导机制不同而已。

也就是说“刘易斯转折点”其实是有两个的，第一个点是由于模型假设农业生产率和农业工资在工业化过程保持不变而出现的一个点，正如前面所述，这个点在现实经济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仅具理论分析意义；理论界大多关注的是第二个点，因为过了这一点不仅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更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的消解和工业化的实现，这一点到来的重要标志是农业部门和非农产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可以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零作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的判断标准，^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经济中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

① Fei John C. H. and Ranis Gustav,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M], Richard D. Irwin, Homewood, Ill, 1964

② 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此文已收入1989年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二元经济论》一书。

③ 不能用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作为判断的标准，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只能从供给上解释劳动力的丰余或稀缺程度，而劳动力是否短缺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也不能以工资水平的上升作为判断标准，因为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之前工资也可能上升，工业积累大于人口增长、不利于工业的贸易条件、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和工会的压力都可能使工业部门的工资上升。

力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是否明显减少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已到了“刘易斯转折点”或临近“刘易斯转折区间”，因为在资本规模和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劳动投入的数量负相关，只要农业的边际产出小于非农产业的边际产出，就说明农业中还有剩余劳动力存在，或者反过来说，只要农业部门有剩余劳动力存在，农业与非农产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就不可能相等。但对一个经济体中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判断又涉及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理解。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绝对剩余还是相对剩余

从当前的研究看，大多数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办法，^①进而给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这最多只能是一个操作上的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定义要说明的是：以什么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标准。也有学者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可以从农业部门抽走后不致于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力。^②这个定义暗含的假设是农户生产的目标产量最大化，而产量最大化的生产目标只有在“传统农业”这个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当一个经济体还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时，这个定义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础。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分析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先进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较落后的农业并存，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我们假设：在二

① 蒋选：《我国中长期失业问题研究——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18页。

②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2页。

元社会中，家庭仍然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但农户同现代农业社会一样是理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给，一部分供应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是客观存在的，这意味着即使某些农户的农产品全部用于自给，他们也能够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农业经营的收益；农业部门内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在短期内，（1）由于农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且农业技术不变，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随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减小，农户的劳动需求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农业工资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无论投入多少家庭劳动力，农户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即农业经营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太多以至于农业的平均工资低于生存水平，那么，多于生存水平工资所决定的劳动力数量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即刘易斯意义上的绝对剩余劳动力。（3）在二元社会中，由于家庭成员教育和医疗等支出的客观需要，也由于存在着消费的攀比效应，理性的户主不可能把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确定在生存水平上，而是将经营目标确定在非农产业的平均收入上，此时，家庭内多于由非农产业工资所决定劳动投入数的农业劳动力则为剩余劳动力。显然，此时的家庭农业剩余劳动力既包括为生存需要而产生的绝对剩余也包括为了提高家庭收入需要而产生的相对剩余。

根据以上分析，（1）我们可以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由生存目标所决定的绝对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标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两部分。（2）在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基本实现温饱的二元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户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尽管从微观

上甚至在中观层次上存在农业劳动力的绝对剩余。(3) 在相对剩余的情况下, 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4) 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相关, 当非农产业的收入提高时,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加。(5)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负相关, 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 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变, MRP_L 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6)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正相关, 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 农产品价格上升时,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上述分析的基本结论是: 在二元社会中,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 其本质是产业间收入差距所引起的相对剩余。这就是说只要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存在着收入差距, 就一定存在着农业剩余劳动力, 收入差距越大,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越大。这一结论与“费—拉模型”中“伪装失业者”的含义是一致的, 因为农业和非农产业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本质上是由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差异所决定的。只有当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从而同质劳动力在两个部门的收入相等时, 劳动力市场才能一体化, 整个社会才能“资本主义化”。

(二)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量估算

根据上述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分析, 我们可以参照英国肯特大学 A. P. 瑟尔瓦计算贫困人口的方法, 来计算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量, 所不同的是计算的收入参照线不是“贫困线”而是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其计算公式为:

$$U = L_A - L_{NA} = L_A - \frac{O}{W_N}$$

其中， U 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数， L_A 为实际农业从业人员数量， L_{NA} 为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等于非农产业平均工资时的农业从业人员数量， O 为全社会实际农业经营收入的总量， W_N 为非农产业人均工资。如果我们分别以农民工就业最多的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平均工资为参照标准，可计算出我国 1997 年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断上升，1997 年约 1 个亿，2003 ~ 2005 年之间基本保持在 1.9 亿人左右。^①

回到“刘易斯转折点”这个问题：如果上述分析和计算是合理的，那么由于存在着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肯定地说，我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区间”还远未到来。

这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何以经过近 30 年成功的经济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高速经济增长，包括世人瞩目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村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等一系列能够大规模吸收剩余劳动力和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却没有降低，绝对数量也没有减少？”^② 二是如果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有如此之多，何以出现 2004 年以来持续多年的“民工荒”？

对第一个问题的解释是：（1）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量是由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引起的相对剩余，收入差距越大，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量越大；（2）从劳动力的供给基础来看，尽管我国近年来的人口出生率和劳动人口增长率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在增加；（3）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方式有关。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业能实现稳定就业，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扩大和时间的延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量就越来越小，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在非农产

① 数据来源及具体的计算方法详见专栏 1.2。

② 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载于《中国人口科学》2007 年第 2 期，第 3 ~ 4 页。

业不能实现稳定就业，而是流动的、“候鸟”式的，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量就不会减少。

至于为什么我国会出现持续多年的“民工荒”，则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决策有关，需要清楚地区分存量与供给量的概念。

三、农民工短缺：存量短缺还是供给短缺

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并不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户主的劳动力供给决策。

由家庭联合劳动力供给模型可知，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否到非农产业就业取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前后家庭总效用的比较。只有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家庭总效用不低于转移前的家庭总效用时，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到非农产业就业，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家庭总效用又取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净收入。只有当农业剩余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获得的净收入不低于某个临界值时，才会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当净收入小于临界值时，没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当净收入等于临界值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不稳定供给；当净收入大于临界值时，才会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至非农产业后的净收入是非农产业的平均工资和流动成本的差额，如果非农产业平均工资远高于农业经营的平均工资，但流动成本上升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净收入小于转移发生的临界工资时，就一定不会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

简而言之，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取于家庭总效用的比较，效用取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的净收入，净收入又取决于非农产业的工资和劳动力转移或流动的成本，即使非农产

业的工资远高于农业工资，但如果转移或流动的成本太大，以至于劳动力转移后的净收入低于转移发生的临界工资时，就必然会出现一边剩余一边短缺的现象，相关研究也表明农民工流动成本的上升才是我国近年来“民工荒”的真正原因，^① 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作 者

2010 年 1 月 5 日

① 相关的研究文章如：赵武、刘艳：《“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载于《经济学家》2005 年第 3 期，第 124 ~ 126 页；姚上海：《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民工劳动力要素价格扭曲现象剖析》，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9 期，第 110 ~ 113 页。

摘 要

工业化过程一般都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在中国这个人口存量巨大的国家，这两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看，二元结构能不能消解，农业劳动力能不能协调有序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工业化的成败。

本书以我国资源禀赋状况及工业化阶段为宏观背景，以农户和农业产业组织的分析为微观基础，以三次产业结构及各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和升级为研究主线，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用长期、动态、非均衡的方法，着力研究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1）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内涵、性质、存在形式；（2）产业结构变动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依存关系；（3）农业经营的组织制度创新与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与需求；（4）制造业发展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和劳动密集型技术运用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转移；（5）城市化、服务业发展的动因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和转移。

本书认为，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相对剩余和绝对剩余两个部分，但主要以相对剩余的形式存在。相对剩余的原因是产业间的收入差距，相对剩余的本质是结构性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想模式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量恰好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并等于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量。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要不要转移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转移的速度和规模问题，而是在尽可能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成本的条件下，如何使农业劳动力的相对剩余量恰好能被非农产业部门所吸收，这就必然要求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三次产业的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关系。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合理有序转移有赖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向合理化的方向调整,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调整空间,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农业落后,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和服务业发展的不充分,这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农业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和工业化的顺利进行。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三农”问题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则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长期落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以单个小规模农户为农业经营基本单位的农业生产组织制度不能适应市场化经营的要求。近几年来出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正是农业经营制度的变迁。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了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提高了农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二是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增加了就业的岗位;三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优化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农民收入的增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有着重要影响。

在投资规模一定的前提下,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吸纳能力。但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战略在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的同时也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应实现由“以外为主”向“内外兼顾,以内为主”的转变。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拉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从工业化的演进规律来看,服务作为就业增加和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长远方向是毋庸置疑的。在工业化的长期过程中,服务业可以通过自身的发展直接地、和通过促进工农业发展间接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从本质上看,工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工业化提供了服务业发展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但产业政策和城市化水平也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特定的工业化阶段,即人均收入水平一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定、服务业发展的供给因素一定的条件下,不同国家不同的城市化水平和不同的产业发展政策造成了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业

吸纳农业劳动力能力的差异。因而，必须把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作为我国今后促进劳动就业的战略方向；必须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全面推进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努力优化服务业结构，促进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总而言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不仅有赖于三次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也有赖于各次产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